

更多的人死于心碎

姚暨荣 林珍珍 译

译 序

人类真是命运多舛。刚刚摆脱了战争的生灵涂炭、饥饿的愁云惨雾，又迎来了环境问题、毒品问题，更要命的还有“核威胁”。核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能量的同时，也把所有人都置于其威慑之下。如果全世界的核武器同时引爆，人类几十万年血汗艰辛所缔造的文明社会就会毁于一旦。

与此同时，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在经历一场空前的浩劫。当人们从宗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沾沾自喜时，却愕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。于是乎，或浑浑噩噩，或在毒品中寻找幻境，或者干脆在物欲或肉欲中消蚀一生。

但是，人类的历史，说到底，就是一部怀着乡愁的冲动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。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发展，会进步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一个个的冲动。人总是对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，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这种憧憬被击得粉碎，被挤压成人的潜意识。但即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，这种潜意识也会时不时地表现出来。

索尔·贝娄笔下的贝恩·克拉德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。

不难看出贝恩·克拉德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他一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境界。而正是这种追求，使他陷入了无穷的痛苦和烦恼之中。

其实，这个理想主义者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他只是向往一种纯洁、浪漫的爱情，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传统家庭。可就在这一点上，他打了败仗，彻底垮了下去。

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里，贝恩为了自己的理想苦苦地挣扎。他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，自我改造，却总也无法摆脱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影响和支配。他既要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又不得不顺应时尚，迎合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为此，他的人格总是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之中：一方面，他向往柏拉图式纯朴的爱情，另一方面，却在众多的女性之中周旋。他想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烦恼，却又因为性而陷入生活的困境。为了逃避这残酷的现实，他只好一年四季轮番不断地出国考察、讲学、旅游……

在他第一次婚姻失败后，贝恩开始同不少女人打交道，企图以此来获取新鲜的情感，填补空虚的心灵。结果却是经历了更多的失意和沮丧。可以说，在这期间，他吃尽了女人的苦头，或者不如说，吃尽了追求女人的苦头。这是因为，从精神上说，他始终放弃不了那传统的意识，总是以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和他的女人。结果，总是找不到他所希冀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浪漫。一次次的追求，使他一次次地陷入无法摆脱的悲剧之中。为此，他伤心地说：“人人都有各自的麻烦，诸如关节炎、自尊心受挫、心灵创伤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等等，但最难对付的莫过于爱情。”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发出了下面的呐喊：“为什么人一定要恋爱？爱情既然最伤人的心，处处可见它的伤痕，人又何必犹豫不决，舍不得一刀两断，及早退出来呢？”

说到底，贝恩一次次地同女人周旋，都是为了满足他对理想的渴望。要不然的话，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伤、忧郁和沮丧。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：贝恩每次情场失意之后，并不是为失去某个女人而沮丧，而是为失去向往的目标而痛心。

最可悲的，要数他独居十五年之后的再一次结婚。在遇到年

轻、富有的妙龄女郎玛蒂尔达之后，贝恩欣喜若狂，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人物。殊不知事情恰恰相反，贝恩再一次经历了伤心欲碎的幻灭。

巴尔扎克说过：“有钱人的独生女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配偶。”不知怎么的，贝恩对此置若罔闻，对玛蒂尔达注入了全部的情感，可万万没想到这副漂亮皮囊之下怀着一颗刁钻的心。玛蒂尔达太有心计，以致连她的父亲都称她为“刁妇”。这个女人闪电般地“爱”上了贝恩，并不是爱上了他这个人，而是爱上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名望，因为凭借这一点，她便可以达到进入上流社会圈子的目的。

在这里，索尔·贝娄成功地比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追求。贝恩之所以每每受挫，就因为他向往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他只是在那里本能地追求，追求他认为是至善至美的东西，但这种东西却好像总在躲避他，仿佛永远同他保持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。应该说，贝恩的追求是很抽象的。另一方面，玛蒂尔达追求的目标则很明确，很实在。正因为如此，玛蒂尔达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也许在实用主义者看来，玛蒂尔达的生活态度是可取的，但作者却总是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更高层次的追求。

贝恩理想主义的追求，从一定程度上说，是和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的。当大多数人沉浸在物质享受之中时，贝恩却在那儿独自进行精神折磨。因此，他总表现得与众不同，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感，甚至只能到他的专业——植物生态学中寻找那么一点点的寄托。

贝恩始终想不通这么一个问题；为什么他越是追求，越是陷入无法追求的地步？他想寻找理想的感情、家庭、妻子，又不得不为了维系这种理想而屈从于妻子一家无理的要求。他明明知道玛蒂尔达并不爱他，明明知道他组成的家庭并不是他理想的模

式，可他却不敢面对现实，不敢按自己的冲动从这个家庭中挣脱出去。一方面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孤立无援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有意识地维系自己的理想，维系玛蒂尔达在他心目中虚幻的形象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他甚至不惜改造自己以适应玛蒂尔达的那个社会圈子。到后来，他竟抛弃了自己一向恪守的信条，为了金钱而对自己的亲舅舅大动干戈。

如果说他在寻找自己的理想过程中充满了坎坷、痛苦的话，那么他在维系这种理想中所体验的则是摧人断肠的伤感。他只得生活在虚幻中，自己欺骗自己。他原想根据自己的理想来设计生活，结果却被生活所设计。结果，他开始放弃追求，不再关心他人甚至自己的存在，一切任其自然。生活的悲剧就是如此：你因为要反实用主义而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泥坑，因为要维持自己的信仰而失去了自己的信仰。几经挫折以后，贝恩变得冷漠、焦虑、麻木，只会小心翼翼地维系自己的家庭生活，维系他心目中那个脆弱的信仰。他本以为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就可以达到永葆青春的愿望。可没料到同这位理想中的美人结合之后，自己竟身不由己地陪伴她过起俗不可耐的生活，出没于毒如蛇蝎的拉亚蒙家族成员之中。为此，他时常在夜深人静时，在祷告中向上帝哭述：天哪，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孽，为什么要同这帮恶棍打交道？

贝娄在这里表现的，实际上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，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困境。知识分子受传统教育比较深，对传统的文明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抱有一定的眷恋。而这种眷恋，或者说乡愁，势必会在非常实际的现实生活中遭到嘲弄和挑战。在一次次的遭受嘲弄和碰壁以后，人就不免地产生一种失落感，精神家园的失落感。这种失落感像毒蛇一样地啃啮人们的心。

实际上，这便是作者所要揭示的生命的意义。在索尔·贝娄看来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根本无法把握自己。生活中总有那么

多无法解脱的悲愁苦难，那么多无法超度的恶行不义，而良知又不时地在折磨着人的心。于是乎，人变得郁郁寡欢，成天处在心灵的矛盾和冲突之中。在贝娄看来，这远远超过了核辐射和工业污染对人类产生的危害，是人生的最大悲剧——《更多的人死于心碎》的题意也就在于此。

姚暨荣

第一章

我舅舅 B·克拉德·贝恩是个很有名的植物学家。去年，当他的生活出现危机时，他让我看了一幅查尔斯·亚当斯^① 的漫画。一幅很普通的画，充其量不过能逗人一笑罢了，可舅舅却入了迷似的，老是要找我细细讨论。我实在没这个兴趣，可他锲而不舍，一有机会就提到那幅画。我有些恼了，甚至考虑给漫画配个框，当生日礼物送给他，那样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挂在墙上，免受其烦了。应当承认，舅舅老是让我心烦意乱，就像是一个在你心中占特殊地位的人。事实上，他确实在我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。我爱我的舅舅。

令人奇怪又不得不注意的是，舅舅对亚当斯的其他作品全都没有兴趣。翻遍亚当斯那厚厚的漫画集《怪物集锦》，他也没找到他喜欢的。雷同的表现手法，牵强的黑色幽默，令人乏味得很。惟一打动他的，就是他常提及的那幅画。画其实很一般，画的是一对恋人——神色凄惨的天涯沦落人，坐在墓碑和杉树之间，男的一脸蛮横，女的披着长发。我相信喜欢她的人会称她莫蒂莎，穿着巫婆的长袍。两人手握着手，坐在墓地的长椅上，解

① 查尔斯·亚当斯（1912～ ）：美国连环漫画家。



说词很简单：

“你不开心吗？亲爱的？”

“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一点也不开心。”

“我怎么会迷上这幅画？”舅舅说。

“是啊，我也感到奇怪。”

他抱歉地说，“我每天老是把你拖进来。谈这幅画，你一定厌烦透了。实在对不起，肯尼恩。”

“考虑到你目前的处境，我可以理解。但一般来说，别人着迷的东西并不能让我动心。对你的这种痴迷，我可以忍受一个时期。但我在想既然你需要讽刺漫画的话，干吗不去找漫画大师杜米埃^①或戈雅^②的作品？”

“人并不总有选择的机会，何况在这方面我不像你懂得那么多。中西部的人脑子总是迟钝些。我知道亚当斯不属于大家之列，但他涉及了现代题材。而且，我喜欢他对爱情那种近似疯狂的表现手法。他没在操纵人，不像希区考克^③。舅舅很讨厌希区考克，从希区考克那儿你得到的只是一种产品，而亚当斯则是以自身的痛苦在创作。”

“几个世纪以来，爱情让我们个个成了傻瓜。所以那不只是他的痛苦经历。”舅舅弓起他厚实的肩背，不言语了。他不同意我的说法，因为每当他表示不同意时都是这个样子。他说：“我一分钟也不想同希区考克谈，而对于亚当斯，我想，我可以同他进行颇有意义的交谈。”

① 杜米埃（1808～1879）：法国画家。

② 戈雅（1746～1828）：西班牙画家。

③ 希区考克（1899～1980）：美国著名侦探电影作家。

“我怀疑，亚当斯是不会理睬你的。”

“你虽说比我小几十岁，可见的世面比我多，”舅舅说，“这我承认。”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我生在法国，长在法国。他总爱把我称做“我在巴黎的外甥”介绍给别人，而把自己的处世经验说得一无是处。他当然见多识广，但也许看得不透，或者说，没有带着现实的目的在观察。

我说：“你得向亚当斯承认，你就欣赏他这一幅画。”

“不错，就这一幅画。可这幅画抓住了问题的实质。”

然后，贝恩舅舅开始对我讲述他所理解问题的实质。每个身处危机的人都会这样做。不幸的婚姻使他心神不宁，思路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。

“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基本的、各具特色的困难。”他说，“一个主题演变成无数个变体，变异，变异，直到你希望自己一死了之。我并不以为‘迷恋’是你要表达的词，也不喜欢‘重复强迫’这个概念，尽管我非常崇拜弗洛伊德。‘固定思想’也不适合。‘固定思想’只能用来掩盖或掩饰那些丑陋的东西。有时，我在想，我的主题是否同植物形态学有关，但职业本身很可能并没什么关系。如果我是个搞花卉的，或者像我母亲希望的那样做一名药剂师，我仍然会听到生活‘梆梆梆’的催命声……到你生命垂危时，你得填写一份类似痛苦时刻表的东西，像联邦政府的文件那么冗长。一份你自己的痛苦时刻表，没完没了的项目。首先是身体状态，如有没有关节炎、胆结石、痛经，然后是精神方面，自尊心有没有受到伤害，有没有被人出卖、欺骗，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。而最难填的，莫过于爱情。既然如此，问题就来了：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执著于爱情？既然爱情让他们吃尽了苦头，感情折磨人的例子俯拾皆是，为什么大家不明智一些，早早地避而远之呢？”

“因为大家都怀着永恒的向往，”我说，“或者说只是希望自

己是个例外，成为爱情的幸运儿。”

舅舅总喜欢进行认认真真的讨论，同他谈话必须十分小心。如果谈话时胡乱猜测，那只会增加他的不快。我对自己也要十分小心，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毛病，总是想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，尽管心里也明白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。在最近的生活危机中，舅舅总是想自我反省。对此，我感到应该容忍。因为我的责任，我不可推卸的义务，是让他挺过去。我很清楚他究竟是哪儿出了错，可以一五一十地向他道来。这样做增长了我的自负。当我慢慢地讲述他的过错时，我感到自己很像我的父亲，手势，语调，和蔼的态度，十足的优越感，以及那种足以填补一切差距，充斥宇宙间的自信，活脱是我父亲的再现。发现自己像父亲让我吃惊不已。以父亲的方式而论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正如人们常说的，我这是决心要背叛他。我这块材料比他要好，比他精明，和他不是一个层次。他有超过我的地方，网球、战争经历（这方面我是空白）、性生活、谈话、相貌，我都不如他。可在有些领域（我是指更高层次的领域），他却没有立足之地，我要超过他一大截。而在对待舅舅的问题上，父亲的口音，乃至他用来同你谈话的那几个法语词汇（英语总嫌不够精致），都会让人感到人生目标难以实现。我得重新审视一下我所处的领域，确定它们是实实在在的领域而不是肥皂泡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一旦舅舅倒了，我也将跟着完蛋。这毫无疑义。我想我应该随时陪伴着他。我现在就是如此，只是事先没料到罢了。

贝恩的专业是植物解剖和植物形态学。所谓专家，就是懂得他那个领域的一切，其目的就不必多解释了。比如，专家会说：“我是修仪表盘的，计价器不要来找我。”或者如俏皮话所说的那样：“我不刮胡子，只负责抹肥皂，刮脸请到对面去。”有的专业甚至变得更细，让你脱离现实世界，仿佛生来就有权力远离凡尘。通过舅舅，我认识了一些专业很细的科学家，他们的怪僻带

有特权的色彩。贝恩从没声称自己有脱离社会的特权。可如果他割断了他“外部的联系”，他也许就不会在女人身上吃那么多苦头。

我可以举一个这种割断外部联系的例子。有一回，我们去教工俱乐部同一位顶级专家用餐。当侍者，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，来取菜单时，这位顶级专家说：“来一份国王鸡吧。”那小伙子说：“你一连三天都吃国王鸡，大伯，干吗不尝尝辣味浓汤？”

磨蹭了好一阵子，小伙子总算说服了他。邻桌用餐的人都善意地笑了。不知怎么地，我哈哈地笑了出来。这真是一个令人突然感到荣耀的时刻。在我哈哈大笑时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侧影，像把真人大小的活动扳手，下颚张着。我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这种幻觉，而这回的幻觉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身旁这位呆板的科学家引起的。

这位科学家朋友这种极度的心不在焉并没给他的同事带来什么伤害。这表明他已走得很远，在他的那个领域从事前沿的工作，因而疏远了朋友和亲戚。一流的科学家属于社会最高等级，他们毕竟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。俄国人有他们一流的科学家，我们有我们的。这才真正是最高特权。

所以，心不在焉其实并不值得小题大做的。每个人都明白，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，人们有权力把凡夫俗子抛在一边，这些凡夫俗子靠自己是什么也干不了的。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有史以来最杰出阶层，但即使在这一方面，正如在其他方面，舅舅还是显得与众不同。他并没有要求免受现实生活的考验。他显然没有这种奢望。就这点而言，他可能会被其他专家看成是个呆子，甚至我有时也认为他有点儿呆头呆脑，比智力平平的人还要糊涂。从来也没有人说他智力有问题。事实上，他在专业方面的才智是一致公认的。而且，他洞察力强，博览群书，用凯撒大帝描述罗马将军盖索思^①的话说，是“看透了人的一切”。如果让我来演凯撒，

^① 盖索思（？～前42年）：古罗马帝国将军。

我一定要用讽刺的口吻说这句话。对伟大的凯撒来说，一般人引以为荣的成就，实在不值一提。

在舅舅方面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他无法看透女人的行为。否则的话，他的判断力是不会太差的。

因此，当他开始谈及生活的复杂性时，最好不要鼓励他说下去，这完全是为了他好。尽管他在植物王国里算得上一位天才，他在谈论生活时那股严肃劲儿实在让人吃不消。有时他给我的感觉是个蹩脚的司机，怎么也无法将车子倒进车位，一连十次都不成功，你会恨不得从他手上拿下方向盘。而一旦他不再进行“分析”，停止思维的机器时，他又判若两人。他有非凡的直接描述自己的天赋。他能用非常简单的词句详细描述他的感受，比方说，阿司匹林对他产生的影响，服药后颈背和口腔的感觉。对此，我十分好奇，因为大多数人是一辈子也描绘不清自身的感受的。酗酒或吸毒的人糊里糊涂地说不清，疑心病患者永远在那儿自己想自己，而我们中的大多数只知道体内在进行新陈代谢，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嗯，物质正在体内，在有机体的回旋加速器中分解。但舅舅却不同。如果他用 β 阻滞剂测血压的话，一定能详详细细地说出他身体和情感上的感受，讲述他的情绪如何消沉，怎么会变得沮丧。如果有时间听下去，他最终会告诉你他最隐秘的感受。不错，我得常常帮他找到这些感受，但一旦他捕捉到了这种感受，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出来。

他长得很高大。上帝赋予他的这种体形很容易受嘲弄。我那个颇具幽默感的父亲就喜欢说他长得像俄国人的教堂，圆顶上光秃秃的，像电灯泡。舅舅是俄籍犹太人，有一张典型的俄国人的脸，短鼻子，蓝眼睛，脑袋上长着稀稀拉拉的黄头发。如果他的手长得再大些，或许可以冒充钢琴家S·理查德。理查德在钢琴上重重地弹奏时，胳膊从燕尾服的袖筒里往下拽，可以垂到膝盖以下的地方。但我舅舅引人注目的不是他那双手，而是眼睛。实在

难以说清他眼睛的颜色，基本是蓝色，海蓝色，超海蓝色，仿佛是由粉状的天青石调配而成。更让人诧异的，是他观察人时那种专注的神情。有时你甚至会感到这种注视力咄咄逼人。那双眼窝像横卧着的“8”字，这模样有时会让人颠三倒四，凭空生出一些怪念头来。比如，你会想：这就是看的功能，看本身的功能，眼睛生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或者，你会想，光线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才将这些器官从我们人身上挖出去。你当然不会想到像光线这样的东西会孤立你。所以，当贝恩开始向你劈头盖脑大谈特谈生活的复杂性以及“社会决定因素”时，你没有必要太当一回事。因为你所看到的，并不是那个由“社会决定因素”构成的那个人的目光。舅舅其实也难得这么劈头盖脑地对人说话。他喜欢以天真无邪的形象出现，一副天真无邪、不知所措、甚至呆头呆脑的样子。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这种故意的，或者说精选出来的“纯真”显得非常奇怪，但我在此不想多加探讨。

很明显，我一直密切注意着他，保护他，监视他，研究他的需要，替他排解威胁。作为一个奇才，他需要特殊的照顾。怪人有怪人的需要，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他可贵的怪诞。我千里迢迢地从欧洲赶来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接近他。我们俩在各方面互相依赖，无法分离。除了对方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朋友。我感到自己不能失去他。舅舅不喜欢标高绝俗，做出一副奇才的样子，即使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“定律”也无法禁止他这么做。他这个人从不开口闭口“科学的世界观”，我一次也没听他说过。他总是避免显露那些我称之为“怪癖”的性格，也不喜欢别人监视或监督他。他会说：“我又不是杂耍中那些跑跑龙套的小丑。”这句话表明了他的年龄特征。的确，那种在狂欢节杂耍中出丑起哄，让女人长胡子，伏班吉式大扁唇的做法，早就从他身上消失了。有时，我想这种性情只是转入了地下，它们会在私生活中以“心理形状”重新表现出来。



据贝恩的一位同事说，贝恩是个“知名度很高”的植物学家。一般来说，同事是不会这么称赞的。但我想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一般的人干吗要对树叶的组织或根的遗传性感兴趣呢？要不是我舅舅是干这一行的，我也绝不会理会这些东西的。哼，科学家？除非他们从事癌症研究，或者像卡尔·萨甘^①那样带着你去太空遨游，否则的话，他们对老百姓有什么作用？普通大众关心的是心脏移植，是治疗艾滋病的新药，是返老还童。他们对植物的结构丝毫没有兴趣。为什么要有兴趣呢？当然，他们可以容忍研究植物的人。一个强大的国家总是能容忍一些这样的科学家的。比较而言，这些人也花不了国家多少钱。在斯特茨维尔，关押两个犯人的费用就足以养活一个植物学家。但在大众看来，两个犯人比科学家带来更大的刺激：他们会在监狱里制造骚乱，纵火，用绳子勒死狱警，把木棍插进看守的脑袋，实在要让人感觉刺激的多。

但在美国当一名学者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这你尽可以相信我，因为我本人就是一名学者。我并不是说我相信当学者有什么好处，只是说我是个学者，暂时可以称得上是位学者。我是俄罗斯文学的助理教授。这个职称让我激奋。可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？同布鲁斯·斯普林斯梯恩^②、卡扎菲上校或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相比，这种研究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和舅舅在同一所大学任教。不错，是靠他的关系让我得到了这个位子，可这个人并不真正适合在大学里工作。事实上，就传统意义而言，所谓“象牙塔”已不复存在了。大学里的确还有学识渊博的学者，但已经不那么引人注目了。现在大学的部分任务是“提高觉悟”，也就是说，是帮助学生摒弃惰性。只有当人们摒弃了惰性，才可

① 卡尔·萨甘（1934～ ）：美国天文学家，致力于外星人研究。

② 美国摇滚明星。

能使生活更有意义。比方说，黑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惰性在人权运动中摒弃了，黑人也就加入了觉悟的群体，从而创造出一种“理想的语言”。没有理想，就不可能推广和宣传自己的志向，而大学则成为必不可少的术语的发祥地。这些术语通过诸多的渠道进入社会生活。法庭，讲坛，家事咨询，犯罪学，电视网络等等都是术语传播的渠道。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巨大的人力资源从大学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部门，流向国防部、国务院、财政部、联邦储备局、情报部门，甚至白宫。现代大学还是生物工程、能源生产以及电子技术的人才基地。大学的人才为复印机设计了极化光源，从通用电话电气公司等企业获取投资资本，成了大集团公司的企业家、顾问、权威专家，或者是国会裁军委员会、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技术顾问。有时，连我也以俄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参加类似的活动。

可我舅舅对这一切非常陌生。尽管他也是一位专家，可从来不知道权力斗争和肆意挥霍，对工程师和商学院从事的活儿一窍不通。他代表着（似乎代表着）那种在各种惰性被摒弃前旧式的单纯。这里，我必须指出的是，他只是献身于植物学的研究，此外什么都不懂。除了和植物有关的满足之外，他还希望有一些常人的享乐，正常的、一般人的享乐。于是，他便去争取了，可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痛苦。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。他在鳏居了十五年之后，又结婚了。他的第二任妻子绝对的不同一般。她长得比他前妻漂亮，但很难相处，更让人受尽折磨。当然，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，但事实确是如此。她是个美人，但这种美和魅力都流于表面，外人很难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窥视她的内心。而我的舅舅又十分乐意以她希望的方式看待她。舅舅别无它求，只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，只希望两个人相亲相爱，共度天伦。这种人类普遍的向往本不难实现。不管怎么说，在西方，人们还在试图实现这一向往，使婚后的各种利益有



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在这儿，我不想谈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，因为那儿的人们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，还在为生存而拼搏。

舅舅被“盲目的激情和吸引”搞得神魂颠倒。这“盲目的激情和吸引”是“迷恋”这个词的第二条词义，其第一条词义为“变得愚不可及”。舅舅甚至把他的新娘比做爱伦·坡诗中的“可爱的人儿”。爱伦·坡在诗中写道：“你紫蓝色的秀发，典雅姣美的面庞。”我第一次听他这么描绘她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的反应是——瞠目结舌。他结婚时我正在国外省亲。他利用我外出的机会，事先也不打个招呼，就同那个女人捆在了一起。其实他知道他应该事先同我商量一下，我俩之间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。我从没想到他会这么不通气，行为古怪。当他向我报告这一消息以后（这无异于给我一记耳光），马上抛出那些溢美之词，什么“紫蓝色的秀发”，“姣美的面庞”，想让我解除武装，不去追究他。啊，天哪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无法承受强加于我的这一切，我不可能不恼火。我这个人从来不阻止别人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他们要说就说去吧！舅舅知道我奉行的一条原则是尊重别人的感情，宽容别人在感情专注时所表现出的笨拙或鄙俗。因为我知道，即便是位四星大将，或者北约组织中备受同行敬重的要员，在沉湎于情意绵绵的爱河时，也会哼起平·克劳斯比^①所唱的情歌来。这种在一个人身上同时表现出的才干和愚蠢，最精确的说法就是“不开化”。舅舅竟然想用爱伦·坡的诗句来抚慰我，我真还不如听听平·克劳斯比的情歌。我真是沮丧、气愤到了极点，因为我碰巧认识他的新娘。她叫玛蒂尔达·拉亚蒙。我想，你得承认她的脸长得很典雅姣美，而舅舅作为搞植物学的，自然会十分欣赏那紫蓝色的头发。我不由地想起这个华兹华斯式的科

① 美国著名歌唱家。

学家，居然会在母亲的坟头研究起植物来，真是铁石心肠。我在想：如果这些人不再在坟头研究植物，他们的心恢复正常时，他们还会这么做吗？

如果把舅舅归类到这些人中间，似乎也不公平。他是个有感情的人。到今天还保存着中国的圣人所说的原始的感情。这不是桩容易办到的事。因为，如果说人们的“初心”没有被歪曲得面目全非，也一定被扔进“自我”的熔炉，以满足实用主义的需要。可舅舅与众不同。他确实是个有感情的人，尤其热爱家庭，敬重父母。有一回，他找借口把我叫到墓地，在墓边哭了好一阵子。他亲自选了一种深绿色的仙人掌，种在坟边。他说选这种植物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目的。看似一句无关紧要的话，其实暗示了他的专长。事实上，任何植物都可能引起他的一番评论。我甚至认为这种仙人掌是一种媒介，他逝去的亲人通过它们向他传递这种那种的信息。

我也不得不暗自思忖：如果我父亲先我而去，我是否会在他们坟前鞠一把泪？我体质不行，而我父亲却身强力壮，相貌堂堂，都快七十岁的人了，依然对女人很有魅力。为此，他十分得意。两年前他曾说：那首伤感的旧民谣“到十二月你还会像正月那么爱我吗？”应该改成：“到十二月你还会像十一月那么爱我吗？”父亲不那么幽默，但偶尔也会说几句好笑的话。至于我母亲，就是她那个年纪的样子，甚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大。她身体已基本垮了，一点也不硬朗。她长他弟弟十岁，两人毫无相像之处。

现在，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当我去见舅舅时，心里想的是现在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新的经验模式。人们把这种模式当做一种权利在争取，实际上它属于人权范畴。“给我一种新的经验模式，不然的话就会迷失。”就个人哲学而言，这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。……希望不要误解我的意思。我对理论不感兴趣，也不